

■热点观察

前不久,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办,网络安全与治理成为焦点话题。今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0周年。如今,互联网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革。互联网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拥抱互联网?

改变世界的开放互联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汪晓风

互联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了一个名为阿帕网的联网项目,目标是建立一个分布式网络,当某个节点遭损毁时,由这个网络支撑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继续发挥作用。该网络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无中心和开放性,这种设计理念非常有吸引力,新的技术、协议、应用、设备不断加入进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商业开放更使接入用户、数据及应用高速增长,逐渐发展为今天连接逾100亿个设备和30亿个用户的庞大网络,成为世界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

互联网的成功可以从多个方面来阐释。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一项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往往能够带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效率提升、行动便利和成本降低。其一,开放是互联网核心理念,也是互联网的价值基础。以太网拓扑模型的发明者罗伯特·梅特卡夫认为,网络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这一关于网络外部性的规律被称为梅特卡夫法则。开放既推动了参与的广度和分享的深度,也赋予价值增值的必要路径。由于参与连接的节点越多,价值越大,当30亿人都成为互联网的节点并以各种方式分享智慧和创造力时,互联网所蕴含的价值就极为可观了。其二,互联是互联网的基本形态,也是互联网的成功关键。连接是人类社会的本性和交流的基础。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提出“小世界理论”,即任意两个美国人只须通过六次信件传递即可建立连接,该理论揭示了一个人际联系网络的存在。而在2006年微软对MSN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任意两个用户间建立连接所需的次数降至3.8个。随着脸书、推特、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覆盖了80%以上的互联网用户即逾1/3的世界人口时,两个用户间建立连接所需的传递进一步降低。这意味着人与人的交流更为简便,更易于产生合作。

随着互联网和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等领域的不断融合,人际、组织之间和国际的互联互通不断扩展,市场、社会和国家的互动也获得了新的驱动力,进而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行为模式的变化和权力形态的转移。

首先,互联网促使组织从等级到扁平进而改变了市场运行模式。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接入门槛的降低,赋予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和灵活性,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各种潜能。个体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身份不再是分离的,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正从以垂直的等级制为主体向扁平的网络结构转变,众包、众筹、分众、团购等新的生产、融资、传播和消费方式不断涌现。商务已自然地为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之区别已被彻底颠覆。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和变革的力量,改变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互联网促使信息从稀缺到冗余进而改变了社会行为模式。互联网提供点对点的高速连接和传播模式,用户生成内容模式下的自媒体已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使得信息本身已不再是稀缺物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行为日益趋同,个人选择、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的模式都有越来越相似的趋势,而且从获取信息到采取共同行动的间隔越来越短,如短短数月间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又如此起彼伏的占领行动,无不是社会行为趋同在不同时空中的反复再现。

第三,互联网促使资源从集中到分散进而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传统权力形态以强制和激励为主要实现途径,国家把对核心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作为权力运用的主要手段,国家综合实力也表现为自然资源的多寡和生产转换能力的高低。当一些国家相继将互联网发展和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时,网络节点的多寡就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库等高价值节点也成为国家防御的重点。在新权力形态挑战和旧权力形态式微的过程中,互联网无疑是重要的点化器。

时至今日,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球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趋势已经形成。降低以至消除因自然禀赋、经济状况、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而形成的数字鸿沟,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已拥有数量最多的互联网用户群体、成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市场和规模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业,因此,以开放的姿态促进更广泛的互联,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的责任。



网络社会治理可借鉴“水文化”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 王世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晚宴上曾提到,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1月9-11日在江南水乡乌镇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同样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的水文化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水利万物”。《老子》中有“水利万物”的思想。如果说信息如水,数据似水,那么在网络空间的海量流动信息和云端汇集的大数据正在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并正在形成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模式。不仅如此,网络社会的来临,还推动着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共存、互连、协同与融合,给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外交等带来前所未有的驱动和变革。乌镇之桥、运河之水互联互通,互通东西,“水”滋润着各行各业和亿万公民,成为令人称奇的万众创新和大众创业的新平台和载体。

其次是“平之如水”。中国汉字中的“法”在东汉许慎所编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隶属于水部,解释为“刑也。平之如水”。“法”的古文字体由水、廌、去三个部件组成,“水”表示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公正,“廌”作为古代法庭上的动物在决讼后令触不直,“去”则表示驱除邪恶。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7月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和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以及在本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致辞的贺词中都提出要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这就需要运用中国水文化中“平之如水”的思想,按照网络社会民主平等的

治理观,建立起全球网络社会共同治理的新范式,无论大国小国还是强国弱国,都要秉持“平之如水”的法制理念,体现出网络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三是“大禹治水”。四千多年前,禹作为黄帝的玄孙,曾担任治理黄河流域水患的重任,与其父鲧所采取的“水来土挡”的治水策略不同,禹改“堵”为“疏”,以顺水性的大智慧,通过疏通河道、拓宽缺口等方法,让洪水更快地导入大海,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网络社会的治理与大禹治水有相同之处。信息的巨量跨界流动和跨境渗透,通过“水来土挡”的封堵管理显然是下策,也无法成功;只有顺乎网络社会的自然规律,以互连互通、共享共治的开放心态从容面对数据的洪流,以积极疏导、引导的方式推动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才会事半功倍,从而赢得网络社会治理的主动权。

第四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荀子·王制》中的话,用来形容网络社会也十分贴切。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互联网既能带来“载舟”的正能量,也会引发“覆舟”的负效应。2014年11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云计算、打造信息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新措施,让云数据助力创业兴业、便利千家万户。但同时我们要按照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是一体两翼、驱动之双轮的“一体两翼的双轮驱动观”,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共同维护网络的主权安全、数据安全、技术安全和应用安全,让网络社会之“水”真正造福人类并助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学术看台

宗教学研究需要跨学科方法

何勤华在《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上撰文指出,宗教法是指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约束信徒行为且有强制力保障执行的,形成一定规模且较为严密、完整的规范体系。在人类法律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宗教法是一个重要分支,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认为,世界上有多少种宗教就有多少种宗教法,但在中国的法律和宗教语境中,实际上存在三种涵义的宗教法,即各宗教组织以信仰为中心的规范体系、宗教自治法和国家宗教法。宗教法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来阐述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方位

高瑞泉在《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面对近代以来的价值失落和秩序解体,作为保守主义的一翼从19世纪末,儒家就发生了某种转变,开始融摄西方文化,弥合传统与变革之间的裂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秩序。这个以维护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与神圣性为己任的学派,以“中体西用”、“返本开新”为思想与行动纲领,给社会秩序原理预设了儒家伦理学的前提,表明它虽然被称为“方位性”的思潮,却依然决心捍卫其核心价值。与内在张力相应的是出现了两种路径:熊十力走的是学院哲学的路径,从经学去发掘现代秩序原理;梁漱溟则从恢复古礼——儒者讲学与民众运动结合——的路径,试图从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探索社会秩序的重建。虽然有因应形势而变化论辩策略的成分,但都体现了对现代化进程中保守主义视域下的概念化。

“知识失业”是怎么出现的

杨金阳、周应恒、严斌剑在《人口学刊》2014年第5期上撰文,通过构建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大学生个体择业行为模型揭示“知识失业”的原意:第一,高校扩招只是导致“知识失业”的诱因,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大学生整体保留工资对其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的变化不敏感,才是出现“知识失业”的真正原因;第二,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来看,公共部门和垄断行业的工作因为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其待遇变化对大学生保留工资会有较大影响,当其工资与竞争性部门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时,“知识失业”的情况将会恶化;第三,“知识失业”降低了大学生深造的机会成本,劳动力市场分割则提高了大学生深造的收益预期,进而造成局部和短期的所谓过度教育。

对时代中的“物”的思考

孙斌、张艳芬在《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这个时代,物以消费的方式呈现为商品。但是,与消费所带前来的东西不仅是作为商品的物,而且是对物的欲求以及对欲求的欲求。物在人的欲求之场中变成了表象。在视频技术的时代,看被诉诸镜头和影像。镜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物带上近前,同时又推向远处。这就是镜头的辩证法。对更加真实的物的欲求激起了贪得无厌的看和对影像的异化消费。为更加真实的物所付出的代价是人们不再在真实中看到真实。就在更加真实的物向人摆置的同时,人也向着它完全地摆置出了人自身。

大学改革宜“移步换形”

陈平原在《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上撰文指出,大学改革应当当务之急。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要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讳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是“日新月异”。

中国山岳祭祀礼俗的变迁

萧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山岳信仰是古老的世界性信仰,中国很早就发生了关于山岳的神话、信仰与礼敬行为。山岳祭祀是中国传统祭祀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山岳祭祀经历了原始自然崇拜、神秘王权确认与帝国江山社稷保障三个阶段。人们由被动膜拜山岳,到主动册封山神,再到要求山神为我所用,山岳崇拜千年没有改变,但人与山的关系却在不断变化之中。今人的山岳观念较之于古代人的山岳观念无疑有重大改变,人们对于山岳已经由崇拜信仰转变为尊重感恩,因此祭山礼俗发生改变更理所当然。如果在复兴祭山礼俗过程中对传统礼俗进行选择性或者说选择性的传承,则既尊重与继承了传统,也遵循了当代社会的文化逻辑,是传承中的更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尚学峰:文学史研究的新角度

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尚学峰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文献阐释的文学研究”(批准号:08BZ0031)已于近日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课题旨在从文学角度去研究汉代的文献阐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较薄弱,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新课题。课题在选题角度、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方面创新明显,对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

课题重点探讨了下列问题:一是总结汉代文献阐释的发展概况,揭示汉代文献阐释的时代特征。在各种阐释文本之外,重视阐释活动和阐释方式的研究,是本课题的一个重要特点。课题首先考察汉代的文化背景,诸如经学、礼制建设、史学、文学等对文献阐释的影响,再将汉代的文献阐释分为文化阐释、学术论争、政治应用、史料载录和人生寄托五种不同类型,考察其阐释者身份、阐释目的、阐释方式等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而分别阐释汉代几种主要的文献阐释体裁。二是探讨文献阐释中的文学接受因素,也就是弄清阐释者在学术和政治的目的、立场与视野之外,如何以文学的目光来看待和理解作品,发现和揭示作品的文学价值。其中包括阐释者如何以文学接受的原则、方法和视野去理解作品以及从哪些方面阐释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两个方面。对上述内容,本课题分门别类地予以挖掘和论述,以全面展示汉代文学阐释的成就,彰显汉代日益成熟的文学观念。

三是探讨汉代文献阐释文本的文学性。在语言方面,这些文本或韵或散,往往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法,构成一定的感染力。在文体方面,除章句、训诂、笺注等随文作注外,又有传、序、记、解、说等多种体式。在表达方式上,很多文本在随文作注的同时,遥想作者之境遇与情感,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形成议论化、抒情化的特征。课题对此所作的探讨,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审视汉代文学的成就和特征。

四是总结文献阐释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在创作观念方面,重点考察了汉代兴喻文学观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文体文学创作方面,具体考察了文献阐释对论说文和辞赋两种汉代重要的文学样式的影响。在文体方面,课题重点探讨了序、记、传等文献阐释的文体如何向文学文体的转化,或者说这些文体自身有何文学文体的意义。

■资讯

南京大学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谈《共产党宣言》

(特约记者 李亚熙) 11月26日,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邀请,法国著名文学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就《共产党宣言》及其当代价值与学者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克莱齐奥文学笔触背后呈现的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也正是马克思曾经做的事情。他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对于文明的一种反思。虽从事文学创作,但克莱齐奥在高中时期就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章节。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要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要理解什么是共产党,就必须阅读《共产党宣言》。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后,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一文本在思想上的强大影响力:它实际上是对当时世界上所有属于被压迫阶层的力量的一种唤醒和鼓舞。克莱齐奥认为:“在当代的西方思想家中,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或者说像《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观点那样,能够真正地运用到追寻真理的实践中去。”

克莱齐奥还就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韦伯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是正确的》这一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与在座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如今,对于马克思的质疑,对于马克思是否过时的疑问仍然很多。而在此次交流中,克莱齐奥与中心学者达成的共同观点是:自马克思诞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危机的思考以及对危机出路的探索,今天仍然在启迪着我们。

华东师范大学

强化城市的休闲功能

(记者 潘帆) 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休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城市休闲化质量报告》(2014)发布会在沪举行,对当前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质量和层次进行了解读。课题组长楼嘉军认为,休闲是对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终检验。根据评价指标,在报告选取的36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杭州、南京、成都、天津、西安排名前十。排名第一的北京得分79.98分,是排名最后的拉萨的近8倍。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城市的休闲化水平要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休闲化水平总体差异较小。城市休闲化的根本点在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首要服务对象是本地居民,其次兼顾外来游客。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强化城市的休闲功能,把发展休闲作为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手段。

中山大学

新媒体将成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继续教育论坛”11月2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

行,来自广州中山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澳门大学等25所两岸会员高校教师代表探讨“继续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继续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融合、创新、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信息化分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研究员郭清顺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他表示,继续教育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是为社会及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主力军,理应在教育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然而,在现实中,继续教育往往处于高校各类教育的边缘,继续教育机构也往往变成学校盈利工具。相对于学校教育,继续教育能满足学习者更高层次的学习需求;相对于社会上的继续教育机构,高校继续教育机构应该定位于继续教育的高端,为社会提供更为高端的继续教育产品和服务。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新媒体的学习将成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

“第二届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研讨会举行

(记者 晓芹) 11月21日,由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协办的“第二届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研讨会”在沪召开,八十余名专家学者和侨界人士围绕“五缘文化与世界华人社会”、“五缘文化与都市侨乡建设”、“五缘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五缘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等课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交流。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市侨联副主席、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炎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夏禹龙和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分别作了题为“对五缘文化的学理性探讨”、“中国文化的永生奥秘:五缘文化与‘孝、悌、慈’”的主旨发言。“五缘文化”理论的创立者林其锐研究员发表了致辞。他指出,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互联互通平台走向世界、推动实现亚太一家梦的大背景下,可以充分发挥五缘文化这五根纽带、五座桥梁的作用,凭借分布在五大洲近五千万的华侨华人发挥口碑传播的软实力作用,促进全球华人大团结,促进睦邻外交、区域一体化,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在基层

为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于11月20日召开“依法治市与社区自治”专题研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依法推进基层民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的法律制定建设等,展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入研讨。

与会者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基层活力,尊重基层丰富实践,完善基层自治制度,推动基层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引导居民群众成为良好社会秩序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社会基础。此次研讨会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届(2014)“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